

有“米”有“丝”：共产党人承诺让彝族同胞“有吃有穿，过好日子”

践诺，5年间11000多干部到了大凉山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惠小勇、吴光于、李力可)清晨，金沙江畔，岚岚轻笼山崖。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箐口乡白岩沟村，36岁的第一书记曾柱铭又开始入户家访。

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最后阶段，凉山州尚有7个贫困县、300个贫困村和17.8万贫困人口。上万名来自中直、省直、东西协作、省内其他市县、凉山本地州县、国企民企、社会力量的干部，正奋战在大凉山深处没有硝烟的战场，践行着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跨越85年的接力

2018年7月，做完胰腺大手术不满3年的曾柱铭，主动报名赴凉山扶贫。“我从小干农活，走着泥巴路上学，读大学时获得了国家的励志奖学金，一直有回报党和国家的心愿。”

作为成都市成华区熊猫路小学的体育老师，扶贫能发挥什么特长？“早上六点半大家还在睡觉，柱铭已经入户了，晚上八九点钟，我们觉得累了一天，他又去入户调查了。他下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笨功夫’。”雷波县信访局驻村干部李永波说。

古里拉达大峡谷中，西南医科大学来挂职的龙沟乡党委副书记夏纪毅带来了自己的“拿手绝活”。2018年，他以科研资金为支撑，将自己研究多年的黄芩种在了海拔2450米的龙沟乡。去年黄芩

『最后一公里』的新征程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吉哲鹏、庞峰伟)又见“山乡网红”李华明。这位64岁老汉劲头不减，正忙着养乌骨鸡、搞生猪代养，还打听“直播带货”怎么运作。

李华明个头不高，待人热情，嗓门很大。作为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他的成名是因为石漠山区一条一公里多的水泥路。

这条路挂在山崖间，冲出乱石堆，还劈开一块十几米高的巨石，在岩壁上留下刷着红漆的两个大字——“实干”。

李华明的家乡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西洒镇岩头村，因位于悬崖峭壁之上而得名。

西畴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的核心区域，裸露、半裸露的喀斯特地貌占75.4%，是云南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由于从邻村的岔路到岩头村的最后一公里路受阻于巨石和陡坡，出行难曾是全村人最头疼的事。

“当年我们卖猪，抬猪的工钱是猪价的一半；孩子们到村外上学，来回要走两个小时的乱石小道，因为路险人穷，村里的小伙子结婚成了大难题。”提起穷困往事，李华明有说不尽的苦处。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为打通这“最后一公里”的进村路，身为共产党员、村民小组组长的李华明带着15户村民，2003年开始自筹修路资金，用双手和铁锤、铁钎向悬崖峭壁“宣战”。

修路何其难。村里青壮年不多，就老老少少齐上阵；钱不够了，就卖鸡卖牛；不能用炸药炸，他们就打好炮眼，把膨胀剂放到里面，慢慢把石头撑裂。

历经磨难，2014年1月，这个“悬崖村”终于修通了最后一公里的进村路。2015年，当地政府补助资金16万元，村民投工投劳，把毛路浇筑成水泥路。路通后，岩头村里具备了发展条件，实施了人畜饮水工程、村活动室建设和安居房建设等项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外地老板也到村里流转土地种三七。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一公里”的故事激励了不少群众，他们的事迹被拍成微电影，李华明还入选了“西畴精神”宣讲团，成了大山里走出来的励志“网红”。

虽头顶“光环”，但李华明和乡邻不甘现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在村里开办“最后一公里”农家饭庄，政府还帮忙引进乌骨鸡、养猪等项目。“别看鸡棚是空的，其实养大的4000多只乌骨鸡刚卖掉，赚了3万多块钱。”李华明笑着说，下一步要把养殖规模扩大到15000只。路通后，村里人不再抬猪下山，而是引进企业养猪，村民入股分红，目前猪场存栏生猪近500头，第一期分红6万元。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这是‘西畴精神’的核心内涵。”西畴县委书记蒋俊说。像李华明这样战贫斗困的“现代愚公”，在这片土地上比比皆是，还形成“一个发展‘不等式’：政府投入十来万元，群众跟着投工投劳、捐款凑钱，能干出几十万元的事。目前，西畴县的乡村公路有3000多公里，是全省平均公路密度的三倍以上。

2019年4月底，云南省政府宣布西畴县达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县序列。“脱贫摘帽是新起点，我们还要‘修’出一条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蒋俊说。

丰收，每亩收入达到5000元，他却瘦了48斤。

“无论是‘笨功夫’还是‘拿手绝活’，都体现了新时期扶贫干部全心全意为贫困群众过上好日子的赤诚情怀。”凉山州委组织部干部蒲博说。

这份情怀与85年前经过凉山的红军何其一致！1935年，一支年轻的队伍用解救被关押的穷人、肝胆相照的歃血结盟，向彝族同胞宣示“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宗旨。受此感召，彝族同胞护送红军走过布满瘴气的密林。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队伍中已有了近万多名生死相随的彝族青年。

在今天的彝海结盟纪念馆里，一块木板上清晰可见当年红军的标语：“红军要帮助回夷谋解放”。

主持彝海结盟仪式的“红色毕摩”沙马尔各的孙子沙马依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日子里，父母总会鼓励儿女：“将来会好的，共产党不会忘记这里。”

国家民委的一份资料中记载，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毛主席提议将“夷”改“彝”，并解释说：“‘彝’从字形上看‘房子’下有‘米’有‘丝’，意味着有吃有穿，过好日子。”

伴随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红军当年的诺言一步步实现。从“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嬗变，到“跑步奔小康”的美好生活，大凉山巨变凝结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力奋斗。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精准扶贫、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冲锋号。

5年来，机关干部、农技专家、学科带头人、企业骨干……大凉山贫困村寨迎来了110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扶贫干部。

与此同时，凉山已有23位干部在脱贫攻坚一

线献出生命，140人因公负伤。身处和平年代，扶贫一线干部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精神不逊先辈。

走最难的路，啃最硬的骨头

在大凉山扶贫，除了推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卫生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解决超生、辍学、自发搬迁等难题。

“去最高的山，走最难的路。”是成都纪检干部邱婷来到普格县大坪乡时定下的目标。起初，家人觉得对于30出头还未成家的姑娘，3年耽误不起。她却说：“生命轨迹上，没有白走的路。”

她走进了大凉山，也走进了许多人的生命。

2018年10月，当她爬到海拔近3000米的堡里村时，看到一个正在烤火的小女孩，凑近聊天，女孩笑着将一个烤好的玉米递给一身泥水的邱婷。了解到女孩因故寄养在舅舅家没有念书后，邱婷下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乡中心学校找校长。一周后，爱笑的女孩噙着泪花走进了课堂。

“女孩能上学，看起来是个多控辍销号的数字，她的人生却可能就此改变。扶贫落实到每一个独一无二生命上就变得具体了。”邱婷说。

布拖县阿布洛哈村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山体地质复杂。为了修通3.8公里的通村路，四川路桥投入了40多套设备、150多人的专业队伍，其中包括5名博士、10多位高级工程师。2019年11月30日，还租用了一架“巨无霸”米-26直升机从县城吊运设备，这在四川交通史上是头一遭。

今年6月，路就要打通了。“这是一条艰难无比的‘天路’，更是试炼交通扶贫初心的‘心路’。”四川路桥集团凉山项目部经理赵静说。

据统计，2016年以来，凉山州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1.39万公里，增加101个乡镇、1918个建制村通硬化路。

路通了，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来自江油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师熊瑛在布拖县带领乡亲们种出了桃、李、杏和蓝莓。被誉为“凉山西伯利亚”的土地，成了一片丰饶的沃土。

2018年6月，佛山市禅城区委常委徐航来到凉山昭觉县挂帅副县长，开启新的“赶考”征程。

“怎么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农村工作怎么做，都是新考题。”两年里，徐航与当地干部配合促进佛山与昭觉携手，从劳务输出、产业合作带领彝族自治州脱贫奔小康。今年为应对疫情影响，佛山市禅城区企业还定向接收了752名昭觉农民工。

在布拖县觉撒乡，64套安全住房、通村公路等16个项目原计划2月初开工，但由于疫情推迟了时间。这急坏了国家能源集团派驻布拖县觉撒乡脱贫攻坚专职副书记杨永林。2月5日，他从成都冒雪自驾600公里返回觉撒乡。一边给老乡们做好疫情防控宣传，一边协调施工单位进场，同时还组织群众就近务工，发动种植茵红李……面对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重担，这位藏族汉子说：“再难也得上，没有退路可言。”

践诺，永不停止

5年前，凉山州尚有11个深度贫困县、2072个贫困村。通过艰苦卓绝的精准扶贫，凉山已实现1772个贫困村退出、80.1万贫困人口脱贫。2020年，凉山将全面攻克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当年国民党对彝族群众是驱赶，共产党则

是主动接近。我们和革命先辈间隔了几代人，但我们依然做着同样的事：走近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雷波县公安局局长李鲲鹏说。4年前，他告别了工作近20年的成都市公安局，来到雷波，一手抓公安工作，一手抓脱贫攻坚，在修路、建房、发展产业的工地上摸爬滚打，他感叹自己从局长干成了“村长”。

这两年，曾柱铭因控辍保学、拆旧房挨过骂，在运核桃的夜路上多次遇到塌方、爆胎，但挨家挨户发现问题、尽心尽力解决问题的决心从未动摇。如今，箐口乡箐箕村的“95后”第一书记李轲把他当成了榜样，也学会了和农民拉家常、干农活。

金沙江畔的幸福村摘掉贫困帽后，曾自掏腰包修路、带领大家种植青椒脱贫致富的村支部书记拉马尔且成了村里最穷的人。

儿子在成都念大学，上学期拿不出生活费，他给孩子带了30多斤苦荞面去学校。儿子问他为什么不能申请助学金。“我告诉他，爸爸是干部，不能麻烦国家。”

今天，除了湖水波光依旧，彝海村已难觅旧时模样。

201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在此与当地彝族同胞再次“结盟”，启动为期5年的定点帮扶。

如今，“红色毕摩”沙马尔各的后代仍住在彝海。沙马依姑从1986年起就一直守护在结盟圣地，现在担任彝海结盟纪念馆管理员。

他说，这是见证过先辈诺言的地方，无比神圣。他对自己也有一个诺言——这份守护，要世代代。



“小”女人的脱贫大智慧

▲5月14日，齐敏在家里粉碎玉米粒。

齐敏家住贵州省龙里县洗马镇乐宝村后坝组，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行动不便，今年45岁的她身高只有1.3米。2007年，齐敏从龙里县谷脚镇谷冰村嫁到洗马镇乐宝村，与贫困户夏山芹结为夫妻。起初，齐敏看到乡邻们靠种植辣椒和养猪增收，也参与其中，但因没有掌握好种养技术一直未获成功。不服输的齐敏通过书本学习和虚心请教，将自家田地作为实验田，水田改为旱地，结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通过近十年时间的摸索，终于掌握了一套适合当地的辣椒种植技术。她种植的辣椒成色好，产量也大幅增加，终于得到市场的认可。

家庭收入提高后，她主动申请放弃低保。2017年，在龙里县残联等相关部门的资助下，齐敏注册成立了“龙里县众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40余户村民靠种植辣椒增收，当年被龙里县评为“德行龙里十大年度人物”。2017年年底，齐敏的家庭顺利摘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帽子。2019年底，为了让村里因交通不便撂荒的1000余亩耕地变成菜地，齐敏和乡亲们集资3万余元，克服重重困难，在陡峭的山谷里修通了后坝至烂坝的4.5公里产业路。成了当地致富带头人的齐敏，积极申请入党，目前已是预备党员，她还注册成为农技志愿者，把掌握的辣椒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乡亲们，帮助乡亲们联系和拓宽销路，和大家一道致富奔小康。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贫困户“收入清单”里的稳定脱贫探索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阳建)见到刘怀荣时，67岁的他正赶着两只黑山羊回家。整改后的瓦房，敞亮整洁，门前堆着柴火。87岁的老母亲，已做好晚饭在等他。

“这是1个月前乡里扶贫干部送来的黑山羊，养到底就能卖钱了。”他一边赶羊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刘怀荣的家在湖南浏阳市小河乡皇碑村。年老体弱，缺乏劳动能力，5年前母子两人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解决了低保，发放了养老金，对他们实行兜底保障。

“原来是住土砖房，政府出钱整修成了瓦房，还从山上给我家引了干净饮用水，装了水罐。”刘

怀荣说，党的扶贫政策让家里生活大变样。

浏阳市在3月份探索出台了“三表一单”制度，即对未脱贫户有脱贫困难、已脱贫户有返贫风险、档外户有致贫隐患三类对象进行摸底造表，梳理出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确保不因疫情影响脱贫质量。

小河是浏阳市最偏远的乡镇，总共5个村，其中2个是贫困村，共有贫困户346户、1068人。截至去年底，全乡仍有35户、68人未脱贫。为了落实“三表一单”制度，小河乡的干部再次深入走访所有贫困户和“边缘户”，并根据实际情况完善“一户一策”的帮扶措施。

刘怀荣与母亲享受兜底保障后，日常生活

不愁了。随着年龄增长，买药看病的开销上升，一年下来手头没有余钱，两人总是担心将来遇到困难可能会返贫。得知情况后，小河乡党委书记梁民召集胡传等扶贫干部一起想办法，最后决定送两只黑山羊崽，引导他自力更生增收。

“养到50多斤，两只羊可卖4000元。”刘怀荣对黑山羊崽带来的“新收入”十分期待，“卖了钱，自己再去买羊崽，这样每年就多了一项稳定收入。”

说话间，刘怀荣从屋里拿出一个本子，里面记录了自己和母亲的年度“收入清单”：低保收入10080元，养老金5000元，高龄补贴1200

元，生态补偿款325元，种粮补贴248元……

“加上卖黑山羊，今年总收入大约21000元。”刘怀荣说，政府兜底资金用来日常开销，每年养羊的钱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据浏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斌介绍，该市已按“三表一单”制度要求，对全市15766户贫困户和29458户“边缘户”进行全面摸排，制作了动态跟踪图表。目前，已确定397户“三表”对象，并重新制定了“加强版”的“一户一策”。

刘怀荣说，送来羊崽后，扶贫干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门来看一看，还留了养殖技术员的咨询电话。“他们为贫困户的长远着想，我一定会把羊养肥。”

金银花开金银来

新华社兰州5月20日电(记者黄泽民)陈均迪改种金银花之前犹豫了一年。能挣钱吗？她思来想去，决定观望。

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李家店乡，群山连绵起伏。全乡有7个贫困村。经过试验，当地在2017年推广种植金银花1400亩。效益很快显现：第二年亩产达200斤，到第三年就能“开足马力”，亩产上到500斤，按去年10元每斤的收购价算，着实增收不少。

36岁的陈均迪是李家店乡李店村村民。前两年她接连参观金银花种植基地，去年发现农户都挣了钱，不再犹豫，当场决定买苗子。

“从前家里10亩地种玉米、小麦和洋芋，都是自己吃，剩下的喂猪，没办法卖钱。收入少，生不起病，孩子有个感冒发烧就发愁。”陈均迪告诉记者，这几年多亏政策支持，加上丈夫在外打工，去年脱了贫。

今年第一轮金银花采摘期预计在5月底。收获在即，陈均迪更是多了希望。她说，和玉米、小麦相比，金银花轻得多，除草、采摘也轻松，自己一个人就能打理，收获季不需要丈夫中断打工、回家帮忙。

像陈均迪一样，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户打消顾虑，搭上了这趟脱贫致富“快车”。李家店乡党委书记张建胜告诉记者，最初有农户担心种了金银花没处卖，为此乡里引进收购企业，从2017年10月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成育苗基地、标准化种植基地、烘干厂房和加工基地，形成了产业链，销售渠道也有了保障。

在烘干厂房入口处，张贴着金银花鲜花收购标准的通知，什么颜色、品质的金银花对应什么收购价格，全都标示清楚，一目了然。

张建胜说，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户积极性，只要他们采了花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必须当场算清账、付现金，“让老百姓只要采到花就可以见到收益。”此外，还有每斤5元的保底收购价，“只要种了金银花，收入就有保障。”

今年全乡金银花种植面积达8714亩，其中2400亩是合作社流转种植，其余由全乡1766户农户自行种植，其中包括88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近八成。

规模铺开了，技术也要跟上。“我们有全覆盖的培训，一年至少4次，季节不同，培训的技术也不同。全乡组织培训之后，各村合作社也会组织农户到田间地头学习。”张建胜说。

陈均迪也接受过培训。她走在田间，时不时蹲下来指着一株金银花告诉记者，哪些部位要摘掉，如何识别、处理杂草。她和记者算了笔账：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丈夫出门打工时间晚了许多，但有了金银花，家里收入不会比往年差。日子越过越红火，从前不敢想，现在她有计划买辆小轿车接送孩子上学。